

想像之城： 南朝詩歌中的洛陽長安書寫及其文化意涵*

祁立峰**

(收稿日期：107年1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5月4日)

提要

我們知道南朝雖定都於建康金陵，但就目前現存的文學作品來說，南朝士人詩中提及或描寫建康的比例並不高。相對來說，如「長安」、「洛陽」等樂府舊題，卻成為當時寫作者熱衷的題材。因此過去學者有此一說：認為這些長安與洛陽（或京洛）的書寫，實則就是對建康的指涉。本文實際爬梳這些以洛陽和長安為題的作品，發現它們的潛文本實際上可追溯至兩漢的都城大賦。人文地理學有個說法，記憶與文本中的城市都是一種再現，因此，本文從兩個層次切入，首先探討南朝寫作者與這兩座歷史故都的連結；其次探討〈洛陽道〉、〈長安道〉與〈京洛篇〉等詩歌，如何形容與想像故城的繁榮富麗，以及這樣的城市書寫又有何文化意涵。從結論來說，南朝士人關於洛陽長安的記憶，或許不僅是與自身都城的連結，更包括複雜的國族、慾望以及與當時文風的混合，所呈現出的獨特樣貌。

關鍵詞：洛陽、長安、都城書寫、文化意涵、文化想像

* 本文為筆者之科技部專題計畫「都城建康：南朝作家的地景書寫與空間想像」(106-2410-H-005-044-)之部份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獲益良多，謹此誌謝。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已經指出，人與空間存在著複雜的辯證關係。人居住於真實存在的空間，但當空間或地景被描敘時，往往有再現的成份。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城市空間經由一種想像與夢幻的歷程產生意義，留存在記憶之中。但記憶中的城市又無法完整再現，因此我們以記憶（也包含書寫）所再現的城市，僅是一系列的零碎意象。¹人文地理學者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提到：地景本身可以當作一種文化意象，探討其再現與結構的意涵。²此外，城市書寫更是一專門課題，如萊漢（Richard Lehan）或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都提到：寫作者對一座城市的作品也將成為其歷史，³或所謂屬於一座城市的「入族式」⁴。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書中，描寫到欲望之城費多拉（Fedora）時，曾說：當人們根據玻璃球裡城市模型建築它時，它就已經產生變動。⁵我們知道城市的概念並不同於荒原或園田，在於物質建設或人文活動的正在進行式，使得城市始終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由於它隨時處於變動，幾乎無法被精準地再現，只能成為玻璃雪球裡的模型。但反過來說，正因為一座城市無法準確或完整地再現，因此，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想像，去填補（更進一步去積極建構）這座心中的「想像之城」，這可能即是鄭毓瑜所說的「人與空間相互定義指涉」⁶；或是蔡振念所謂「城市居民以語言建構城市」⁷。人、或者說城

¹ 關於班雅明的相關論述，筆者參酌德·本雅明著，王才勇譯：《單行道》（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書，然而本文內容因考慮在地慣用譯名，故以「班雅明」稱之，於此說明。而此詮釋與進一步的運用，筆者也參酌了蔡振念的論述，蔡振念：〈漫遊與記憶——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年4月），頁235。

² Denis Cosgrove,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12.

³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289.

⁴ 關於羅蘭巴特的「城市入族式」概念，出自其《艾菲爾鐵塔》一書，筆者此處參酌黃麗玲、夏鑄九：〈文化、現在與地方感〉文中的分析與論述，該文收錄陳光興：《文化研究在臺灣》（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頁41-42。此外筆者也參酌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7-98.

⁵ 義·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頁45。本文標題「想像之城」即是由此而來。

⁶ 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收錄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正因為破除了主／客觀或現實／想像的二元分界，空間無法單純被反應，同樣也無法完全被編造，這應該是個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文本世界」，頁16。

⁷ 蔡振念：〈漫遊與記憶——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頁236。

市的居民，成了影響一座城市重大的變因。如過去學者研究唐代長安城的論述中所指出的：我們關注都城「不僅是皇家莊重的禮儀舉行的場所，也是市井百姓平凡生活的空間」⁸，也確如其所說：「物質性的空間架構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社會關係結構的運作反過來又界定、限制或調節了不同空間的發展趨向」⁹。

對於六朝寫作者而言，都城建康代表的是政治、經濟的中心，也可能是他們宦遊官署的居處地景，建康本身的商業、經濟的繁榮毋庸置疑，根據《金陵記》：「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戶」¹⁰，劉淑芬認為若以一戶五口人計算，則居民多達一百四十萬餘人，¹¹至侯景亂爆發後才淪落至倖存者十分之一或二的慘況。¹²且據劉氏考察，建康城的特色在城內全無耕地，居民若非貴族則即是商人小販，且市場數目繁多，足見其商業活動之興盛：

建康為六朝之都城，其城市中土地之利用本和其他鄉村社會的地區不同，建康城沒有耕地就是一大特色，宋世江夏王（劉）義恭與孔靈符爭論遷徙山陰居民時，就曾以「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為理由，可知建康的居民中沒有農民。《隋書·地理志》中也指出建康城居民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王宮貴臣，一種是平民，而平民中又多为商人小販。¹³

從「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埽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¹⁴的描述，大抵可見建康之士庶繁眾，商業活動之興盛。然而又如王文進所觀察，六朝作者所創作的詩歌之中，描寫或提及都城建康者甚少（其實辭賦的數量也很有限）¹⁵，反而描寫洛陽或長安的作品甚多。而根據王文進所推測，應是透過歷史想像與投射，將建康的描述與大漢都城長安與洛陽結合：

⁸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與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9。

⁹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與其他》，頁9。

¹⁰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135。此處之所以特別提到城市的繁榮，乃因克特金於其《城市的歷史》書中有個說法，稱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延續長存，有賴於「安全」、「繁榮」與「神聖」三個要素，參酌美·克特金（Joel Kotkin）著，謝佩奴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33-36。

¹¹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135-136。

¹² 根據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頁5008。

¹³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135-136。

¹⁴ 唐·魏徵：《地理志》，《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31，頁887。

¹⁵ 就如今所見，除庾闡《揚都賦》保留較完整外，其餘如曹毗的《揚都賦》僅剩一句，至於夏侯弼《揚都賦》則僅存殘篇。

我的推測是：南朝士人根本就是以寫「長安」的名目來寫建康，試看下面幾首〈長安道〉的縱歌聲色，何處不像是「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的氛圍。¹⁶

南朝出現「長安」、「洛陽」之名者，尚不止限於「長安道」、「洛陽道」。……據筆者統計，長安知名出現七十二處，洛陽出現六十二處（包括篇名），考以金陵四見，而長安、洛陽一百三十四見的比例，南朝人士的時空思維，的確超乎正常的邏輯運作。¹⁷

王文進所謂的歷史投射或許言之成理，但所謂以「長安」縱歌聲色或「洛陽」正統正朔來側寫建康，主要是從〈長安道〉、〈洛陽道〉與〈永明樂〉詩句或意象的類似聯想。其後研究者也有類似的觀點，譬如認為南朝樂府中的長安雖然文獻記載與文學想像，但「南朝城市實際上正是樂府文學中漢代都市想像的藍本」¹⁸。而按照《顏氏家訓》所記，六朝當時士人原本即喜歡用古代詞語（如「分陝」¹⁹這一類詞語）來指稱江南空間，這並不奇特或違和。「長安道」、「洛陽道」等舊題樂府之意象到底是現實的建康投影，抑或是歷史的兩都城之想像，筆者以為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若將先行研究者的論述綜合來看，我們一方面可以了解六朝的都城建康的繁榮與富庶，確實是南朝士庶階級生活居處的場所；然而也確實如王文進所說，六朝作者書寫都城之盛況或熙攘之詩歌相當有限，這樣文本匱乏的現況，一方面或許即是王氏所謂的：將建康形象投射成為長安洛陽的歷史脈絡之中；但就筆者所見，也可能是江南都城的庶民性與俚俗性有些關聯，²⁰最著名的例證即是齊東昏侯在芳樂苑模擬市集之紊亂雜沓，²¹此部份鄭毓瑜於其《文本風景》書中已有相關的論述。²²在本文中，筆者進一步詰問的部份在於——

¹⁶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163。

¹⁷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168。此處須補充說明，王文進所謂的歷史想像，乃是從其《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研究一系列而來，故此處所謂的「超乎正常的邏輯」，並非說此現象不合邏輯，而是說不符合南朝士人身處金陵卻吟詠他方的現象。筆者亦延續此論，認為南朝士人一方面有此想像，但另一方面將北方都城也想像成另外一種情慾與宮體的城市。

¹⁸ 楊基燕、王志清：〈樂府文學中的「都市書寫」——以〈長安道〉〈洛陽道〉為中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4卷第2期（2012年3月），頁145-146。

¹⁹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3：「上荊州必稱陝西」，頁141，舊注稱「梁以荊州在西，有如周之分陝，故稱荊陝」，頁141。

²⁰ 關於此典，鄭毓瑜：〈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有進一步論述，收錄：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關義》，頁97。

²¹ 唐·李延壽：〈東昏侯本紀〉，《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5：「（東昏侯）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禪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頁155。

²²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關義》，頁97。

對於身處的建康之繁盛，我們可以在哪些文本看到殘餘？又或者這些長安、洛陽的想像與紀實，有否其前文本之模擬軌跡脈絡可尋？六朝寫作者如此將看得見的記憶之城與看不見的想像之城結合在一起的書寫策略，實際上究竟如何呈現？

對權力與空間研究頗為深刻的社會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曾有一個著名的異托邦（heterotopia）理論，傅柯提到異托邦有幾個特點：一方面它內部運作的是一種異質時間，在異托邦內時間並非永恆，而是處於絕對瞬間（chroniques）²³；此外，異托邦扮演一個創造幻想空間的意義，以確保現實世界的運作。²⁴本文並不在於套用理論，只是在實際探討中，我們會發現南朝作者透過某種異托邦的元素，來描繪他們認識的、充滿幻想的長安與洛陽。接著我們先從兩漢文本中所建構的「長安」與「洛陽」形象談起。

二、錯把「建康」作「京洛」？

（一）繁榮的西都與文化的東都

日本學者斯波信義曾於《中國都市史》一書中指出，在先秦過度到兩漢的過程，幾個重要的大城市也逐漸由「邑制國家」轉變成為「郡縣制國家」，這進而造就了漢代「通都大邑」的誕生。²⁵而探討長安變遷的學者如王翰也注意到：除了城市實質的物質建設，一座城市或宮殿被書寫之時，即是一種「歷史敘事的改造」²⁶，同時也是「文學想像的填充」²⁷。

若論及「京洛」在六朝以前最著名的經典作品，大概就是班固與張衡負盛名的〈兩都賦〉與〈兩京賦〉了。在班固〈兩都賦〉的序中，很明確提到當時的「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²⁸，因此辭賦裡巧設的西都賓和東都主人之客主問答，就希望能「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在〈兩都賦〉的預設中，

²³ 傅柯的原文筆者參酌網路資源，請見 Michel Foucault, "Heterotopias," *Of Other Spaces* (1967),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最後瀏覽日期：2018.05.05），此處其意思指的是譬如遊樂場這樣的慶典，那是一種歡愉的瞬間不斷複製的場所。

²⁴ Michel Foucault, "Heterotopias," *Of Other Spaces*.

²⁵ 相關論述筆者參酌日·斯波信義：《中國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4-16。

²⁶ 王翰：〈長安敘事：史與詩〉，收錄董乃斌主編：《古代城市生活與文學敘事》（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6。

²⁷ 董乃斌主編：《古代城市生活與文學敘事》，頁26。

²⁸ 東漢·班固：〈兩都賦序〉，引自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4。

西都長安的崑函之固以及繁榮街市，用以相對於東都洛陽的文化建置與典章制度，而班固的〈西都賦〉之格局，很顯然直接影響到張衡〈西京賦〉的鋪衍隸事，於是乎在漢大賦的長安有了一派被設定好的格局與脈絡，而這樣恢宏、人馬雜沓、食客與遊俠豐饒簇聚的城市，成為了其後六朝詩歌的典故來源，我們此處節錄〈西都賦〉與〈西京賦〉各一關鍵片段，一窺其書寫策略：

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班固〈西都賦〉）²⁹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薨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陟侈。木衣綈錦，土被朱紫。……爾乃廓開九市，通闐帶闐。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環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張衡〈西京賦〉）

30

就算大賦的「踵事增華」³¹本來就是其文類條件，但很明顯的關於西都「長安」的書寫，重心在於街市的熙攘、商賈的繁盛、甲族的貴盛。〈西都賦〉的「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一直到「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既庶且富，娛樂無疆」一段，寫九市的繁榮、擁擠，車龍流水之城市盛況，進而將四合東南西北之方位，以一種全幅全景的鏡頭式觀看，將繁盛的都城，歡樂無疆未央的饒富表露無遺。同樣的在〈西京賦〉中的「廛里端直，薨宇齊平」、「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或「彼肆人之

²⁹ 東漢·班固：〈西都賦〉，引自梁·蕭統：《文選》，頁 7-8。

³⁰ 東漢·張衡：〈西京賦〉，引自梁·蕭統：《文選》，頁 61-62。

³¹ 關於漢賦的「踵其事而增華」的文類特質，筆者參酌王夢鷗對六朝「文章辭賦化」的觀點，王夢鷗：《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年），頁 117。

男女，麗美奢乎許史」等等的敘述，透過物質的建設，人文的豐饒，小歷史的庶民街景，這顯然並不同於寫東都長安的大歷史式、國家式宗廟祭祀描述。

除了上述士庶雜沓的繁華與喧騰，城市的人文基礎更與歷史縱深有關，時間的流變必須透過固定的空間，進行動態性的建構。在以上兩段引文中，班、張描寫了長安的「鄉曲豪舉，遊俠之雄」，更有所謂的「張、趙之倫」，他們「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西都長安的物質建設超越先秦的名都，而組成分子同樣也得與先秦那些重要的公子信陵君、平原君齊名，而這些遊俠甲族，也就進而成為都城最顯著的風景，成為都城歷史的一部分，成為爾後六朝擬仿的典故。

過去的人文地理學者大多注意到，一座城市的外貌內涵，與其被敘述被再現有密切的關係。前言徵引過的萊漢（Richard Lehan）與柯蘭（Mike Crang）都提到，如果閱讀城市本身就可以作為一種文本閱讀，³²那麼描寫一座城市的文本，其實也同時建構了一座城市本身。³³當寫作者對一座城市進行描繪的同時，實體之城早已變遷、改易或湮滅，那麼這座城市僅存在於作品中。換言之或說更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城市書寫已然成為了城市的風景一部分，如《看不見的城市》所說的「費拉多城」——一枚永遠無法處於純粹靜置狀態的玻璃雪球。

誠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西都風景，如果說西都是庶民性與小傳統較濃厚的敘事，那麼東都長安則是國家式、典章禮教式的描敘。此處同樣分別舉班、張的兩段引文為例：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班固〈東都賦〉）³⁴

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祿，祈禱禳災。（張衡〈東京賦〉）³⁵

很明顯地，東都洛陽呈現出典正、儀禮備至的風貌。「奢不可踰，儉不能侈」的宮室皇城，週邊「原野作苑，流泉為沼」的風景，或「複廟重屋，八達九房」等形容，在城市營建的

³²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289.

³³ 美·柯蘭（Mike Crang）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58-59。

³⁴ 引自梁·蕭統：《文選》，頁33。

³⁵ 引自梁·蕭統：《文選》，頁106。

物質規模上，以及器物之侈麗繁榮上，其實並不遜色於長安，只是「辟雍」、「靈臺」之規模，「嘉車」、「吉日」之禮儀，在在足以顯示洛陽代表的莊嚴肅穆且文化鼎盛的都城樣貌。那麼這樣看來，本文下一節將談的六朝詩歌「洛陽道」此一樂府舊題，以及其內如「紅塵百戲多」、「金爪鬥場雞」，顯然更接近長安的文本形象而非洛陽風景。似乎長安與洛陽這兩座真實存在卻又成為歷史勝景的都城，隨著時代的演變，文風的遞嬗，典故的挪用，終於呈現出了現實風景與文本再現層次上，截然不同的風貌。本文在重探樂府詩中的「長安」、「洛陽」之前，希望先稍微一提建康與京洛的相似性。

（二）到處存在的「新亭」

相對長安這個西漢的都城來說，作為東漢與西晉都城的洛陽，顯然與東晉之後的南渡士人，有著更緊密的連結。周顛與王導那段「風景不殊，正自有江河之異」³⁶的典故非常著名，「新亭」與「洛水」風景形勢的聯繫，學者也早有論述，如劉淑芬就說：

以地理環境而言，洛陽和建康極為相似，洛陽北有芒山，南枕洛水，西有伊水，東環穀水。建康北有覆舟、雞籠山，南枕秦淮河，西遠臨大江，東有青溪，兩者山川形式頗為相近。因此，在東晉初年之時，由北方南渡的人士在此一和洛陽相似的環境中，更有深刻的感受。³⁷

其實洛陽與建康的相似實不僅於此，如劉淑芬另外舉的例證，任昉形容蕭子良的宅邸，稱其「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邨山洛水，協應叟之志」³⁸；而朱异稱其建康的居宅曰「卜田宅兮西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邨」³⁹，可見將建康比作洛陽，或至少言及建康聯想至洛陽，這在當時以及對其後唐宋文人而言，可能是常見的。鄭毓瑜進而引述劉淑芬此段，進行更深刻的思索：

周顛認為「風景不殊」，只是江、河之異，這固然可以從洛陽和建康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來加以解釋，但是如果也考慮西晉名士常常共至洛水戲游談道，那麼新亭所

³⁶ 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92。

³⁷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170。

³⁸ 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205。

³⁹ 梁·朱异：〈田飲引〉，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320。

在更深刻的感受應該是如何在江東復現這種名士文化活動中共感的氛圍。⁴⁰

鄭毓瑜文中所謂的西晉名士常「共至洛水戲游」，可見於《世說·言語》：「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⁴¹，顯然對西晉士人而言，洛水成了清談論玄的文化地景，相較而言，東晉士人之所以前往新亭「藉卉飲宴」，而後猶如楚囚對泣的發展，本身就隱含有對相似與想像的地景之再現。

事實上一座城市與另一座城市的連結，未必非得透過空間的相似、或所謂共感的氛圍，眾所周知臺灣各地（尤其是臺北）的街道名稱，刻意濃縮了中國大陸的版圖地域，而在當代小說家朱天心的代表作《擊壤歌》中，小蝦與同學望見淡水河感嘆「多像揚子江」的段落，大抵都是屬於我們此代人更切身的經驗。王德威論朱天心時曾說：「她自己到底是外來客，還是在地人？所有的慾望、記憶、與身份重重掩映，讓人難分彼此，所謂事物的真理、歷史的因緣都成了眾生法相的投射」⁴²。而隨著時移事往，淡水河已經不再相似揚子江，只見「時間的逐客，歷史的移民徘徊在江畔」⁴³。

所以我們若將「建康比擬長安」這樣的歷史現象，視為六朝士人對於江南的慾望、記憶以及身份的錯置或歪打正著，當然是可能的詮釋方式，而這種難分彼此的空間疊合，正是「移民」終成「遺民」的六朝士族，他們以其親身經歷所呈現的文本風貌。因此筆者以為，即便建康在地理形勢與洛陽有所近似，但就算與建康並不類似的長安，同樣在士人的敘事與再現中，發掘出長安與建康的連結。那麼也就誠如王文進所說的：南朝士人由於在大漢圖騰的歷史想像中，以長安洛陽想像建康，是「超乎正常的邏輯運作」⁴⁴，他們透過歷史現實都城的結合，在文本中將古都與今都「混」為一談。

但在本文中若我們重新來閱讀六朝詩歌中的「京洛」，就會發現它未必完全等同於建康此一都城，有時是現實的投射，有時是歷史的殘餘；有些部份表現出作者心目中與想像中名都殘影，也有作者將欲望，歷史與記憶進行融合。於是乎長安洛陽可能就成為前言所說的：一種幻想的異托邦。它一方面在南朝被敘述；但另外一方面只停留在〈兩都賦〉或《世說新語》所描繪的那一個瞬間時態。或許遍索六朝文獻，我們查不到太多關於「建康」的文學書寫，但在這些大量關於京洛的書寫中，我們卻能進一步體貼六朝士人究竟如何描

⁴⁰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 137。

⁴¹ 宋·劉義慶著，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5。

⁴² 王德威：〈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論〉，收錄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臺北：麥田出版，2002 年），頁 131。

⁴³ 王德威：〈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論〉，頁 131。

⁴⁴ 王文進語，筆者參酌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 163。

寫他們看得見以及看不見的——文獻裡、想像中與現實上的城市。

三、當「地理」成為「歷史」

(一)「洛陽道」的想像與再現

若以「長安道」、「洛陽道」這樣的詩題進行檢索，可以發現此一同題作品，在齊梁時達到高峰，不可否認地這樣的題材與齊梁之後新變風氣有密切關聯。我們知道譬如陳叔寶、張正見這樣的宮體作家，對漢樂府詩特別感興趣，如原本僅是在言婦女織機技術的〈相逢行〉、〈長安有狹邪行〉等作品，被他們改寫成為〈三婦豔〉或〈中婦織流黃〉這樣香豔旖旎的內涵。過去的樂府詩研究者認為，南朝因「門閥制度發達，貴族文人把持文壇，人們在文藝方面的價值趣向和審美標準，也是依據貴族文人的嗜好為轉移」⁴⁵，而將這些艷情題材的樂府，視為「模仿漢樂府古題的詩，注意形式的華美，內容則往往沿襲舊題，缺乏新意」⁴⁶。

本文此處將寫作者較多的〈洛陽道〉此一題材個別挑出來，且暫時擱置作者與詩成的時間順序，而按照詩歌中所徵引的典故、營造之意象區辨，將其概分而為兩類，其一是與「潘岳挾彈於洛陽道」這典故密切相關的共作：

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遊童初挾彈，蠶妾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

玉車爭曉入，潘果溢高箱。(蕭綱〈洛陽道〉，梁詩卷 20)⁴⁷

微道臨河曲，層城傍洛川。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日起罌罍外，車迴雙闕前。

潘生時未返，遙心徒眷然。(庾肩吾〈洛陽道〉，梁詩卷 23)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駝。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

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徐陵〈洛陽道〉，陳詩卷 5)

曾城啟旦扉，上路落春暉。柳影緣溝合，槐花夾岸飛。蘇合彈珠罷，黃間負翳歸。

紅塵暮不息，相看連騎稀。(張正見〈洛陽道〉，陳詩卷 2)

洛陽夜漏盡，九重平旦開。日照蒼龍闕，煙遶鳳凰臺。浮雲翻似蓋，流水倒成雷。

⁴⁵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07。

⁴⁶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頁407。

⁴⁷ 梁·蕭綱〈洛陽道〉引自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1911。以下引詩皆據遼欽立輯本，僅註明卷數，不另外作注。

曹王門雞返，潘仁載果來。(王瑳〈洛陽道〉，陳詩卷9)

此處蕭綱詩中的「洛陽佳麗所」，與其後沈約的「佳麗實無比」構句很相似，這也容易讓人聯想到謝朓寫建康城的名句「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⁴⁸。誠如研究者所說，洛陽成為建康的投射，⁴⁹但也可能「佳麗」就是形容一座繁盛都城的第一印象——無論是歷史中或現實中存在的都城。蕭綱的詩明確提到城市機能運作運轉時的熙攘和繁榮（「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至於徐陵的「東門向金馬」提到的金馬門，大致上延續洛陽於〈東都賦〉中的形象。但筆者以為此一組〈洛陽道〉共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共用了潘岳的典故。潘岳的這個典故在本質上必須與「洛陽」此一都城意象結合在一起，而與建康沒有太大的關聯，其典故可見於《世說新語》和《晉書》：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世說新語·容止》）⁵⁰

（潘）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晉書·潘岳傳》）⁵¹

潘岳挾彈出洛陽道，擲果盈車的典故其實是一個熟典，關於此事余嘉錫另有解釋，稱所謂「夫老年婦人愛憐小兒，乃其常情，了不足異。既令年在成童，亦不過以兒孫輩相視」，⁵²但姑且不論婦人欽羨潘岳是出於長輩的憐愛或情感的慾望，這個典故顯然與梁陳寫作者對於洛陽的形象以及慾望連結在一起。在上述詩歌中，包括「潘生時未返」、「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蘇合彈珠罷」，其實一方面用了「挾彈擲果」的典故，卻又不斷地進行拆解，如擲果導致「潘果溢高箱」或「潘仁載果來」，那麼則對以「無奈擲花何」；或以「潘生時未返，遙心徒眷然」對原典的意象進行翻轉與置移。

筆者以為從這些詩歌來看，作者所書寫的「洛陽」無疑是文獻中或典故裡的洛陽，而這樣的城市又加入了六朝特殊的美感觀看，比方說「日照蒼龍闕，煙遶鳳凰臺」或「東門

⁴⁸ 齊·謝朓〈入朝曲〉是少數以建康為題材的詩歌，全詩為：「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遼欽立輯本，頁1414。

⁴⁹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163。

⁵⁰ 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610。

⁵¹ 唐·房玄齡：〈潘岳傳〉，《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55，頁1507。

⁵² 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610。

向金馬，南陌接銅駝」等對偶儷辭。前面提過無論班張的〈東都賦〉或〈東京賦〉，東都洛陽象徵的是文化地景，是一典正富瞻、重視典章儀式的都城，並非只是物質文明的華麗堂皇而已，但到了這批〈洛陽道〉作者的觀看下，他們運用的卻是一種宮體化的視覺與感官美學，加上異色豔情典故來重構洛陽。因此，說這樣的洛陽是否等同建康，或許推論過快，因為如潘岳的典故仍然是從「洛陽道」所聯想，但至少這些宮體作家筆下的洛陽，已不同於漢代大賦中的典正東都形象。

至於另外一組〈洛陽道〉，則宮體化巧似化的跡象更為明顯，此處節選幾首：

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裙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沈約〈洛陽道〉，梁詩卷6）

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慢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爪鬥場雞。桑葢日行暮，多逢秦氏妻。（蕭繹〈洛陽道〉，梁詩卷25）

洛陽道八達，洛陽城九重。重關如隱起，雙闕似芙蓉。王孫重行樂，公子好遊從。別有傾人處，佳麗夜相逢。（車敷〈洛陽道〉，梁詩卷28）

洛陽九達上，羅綺四時春。路傍避馳馬，車中看玉人。鎮西歌艷曲，臨淄逢麗神，欲知雙璧價，潘夏正連茵。（陳暄〈洛陽道〉，陳詩卷6）

建都開洛汭，中地乃城陽。縱橫肆八達，左右闢康莊。銅溝飛柳絮，金谷落花光。忘情伊水側。稅駕河橋傍。（陳叔寶〈洛陽道〉，陳詩卷4）

百尺瞰金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塵裏暗，槐色露中光。游俠幽并客，當壚京兆粧。向夕風煙晚，金羈滿洛陽。（陳叔寶〈洛陽道〉，陳詩卷4）

青槐夾馳道，御水映銅溝。遠望凌霄闕，遙看井幹樓。黃金彈俠少，朱輪盛徹侯。桃花雜渡馬，紛披聚陌頭。（陳叔寶〈洛陽道〉，陳詩卷4）

上述這些詩人如陳暄、陳叔寶或蕭繹，很明確是宮體作者，但沈約時代較早，其時尚無宮體之名。然而筆者此處所謂的「宮體化」，指的是像「燕裙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這一類寫燕趙佳人、寫男女遊人外貌衣裝等細膩與巧似的形容。在這一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洛陽「八達九重」的意象，但同時也會發現如「王孫行樂」、「幽并遊俠」、「金羈滿路」、「黃金少年」等更近似長安的城市形象書寫。前面的彈挾較明確地用潘岳的典故，但筆者以為此處如陳叔寶的「黃金彈俠少，朱輪盛徹侯」或「銅溝飛柳絮，金谷落花光」，寫的是洛陽侈麗，但更是一種全景全幅的描述，不僅限定於特定城市。這種（從文字風格到形容意象）的奢華、雕琢與誇張，本身就是本文此處指的「宮體化」傾向。

很顯然這些詩歌極力要描寫一座城市繁華富庶，歌舞昇平的樣貌，但它未必聚焦於洛陽（即便有「金谷」或「九衢」之類的關鍵詞），但也不盡然就是建康的比擬與聯想。他們筆下的城市更接近一想像與慾望之城，包攬了所有繁華絢爛，紙醉金迷的幻想形象集大成。當然，過去研究者可能已經注意到這種「狹斜」特質，⁵³但由於南朝寫作者透過文獻與想像建構兩都，其意象密切疊合並相互指涉。於是乎長安的遊俠與物質奢靡，洛陽的大道交通，再加上建康與洛陽在地理形勢上共有的馳道、御水、青槐與綠柳，甚至是去地景化的「秦氏有好女」的陌上桑故事，最後集大成則如岑之敬的這首〈洛陽道〉：

喧喧洛水濱，鬱鬱小平津。路傍桃李節，陌上採桑春。聚車看衛玠，連手望安仁。
復有能留客，莫愁嬌態新。（岑之敬〈洛陽道〉，陳詩卷6）

無論與洛陽有沒有關係的典故和意象——羅敷、衛玠、潘岳，洛水或平津等等，全都融為一爐，以一種時間暫停瞬間的異托邦之姿，構成士人心目中一座偉大繁盛的都城之形象，這座都城看似應該是指洛陽，但也可能是長安、建康、或「京洛」這樣全稱的形象。這其實也間接形塑出了六朝士人所描寫城市的獨特性，由此殊性我們也能讀出其後的文化隱喻和意涵。接著我們在來談六朝詩歌中提到的長安以及「京洛」這樣的全稱意象。

（二）「長安」與「京洛」

前文已經提過，若從漢大賦所建構的「東都」與「西都」形象來說，相對洛陽的典章文治，長安代表的就是一座城市奢華繁盛，富麗與享樂的形象。而關於南朝士人共作的〈長安道〉，一方面即如前述，將與長安相關或未必有直接連結的意象或樂府情節鑲嵌進入詩歌中，另外一方面也運用了非常宮體化（甚至直接搬引宮體詩句套語）的模式，書寫江南作者想像中的西都長安。因此，與其說長安洛陽在南朝的形象被「建康化」，筆者以為更貼切的說法應當是——這兩座歷史的名都都被「梁陳化」，透過一種似舊實新的面向呈現。

此處同樣不按照時代次序或文學集團的歸屬，而按照其意象形塑與經營，將〈長安道〉共作分為兩組，首先是透過長安的典故進行聯想的作品：

⁵³ 楊基燕、王志清：〈樂府文學中的「都市書寫」——以〈長安道〉〈洛陽道〉為中心〉，頁145。祝麗君也提到：「陳人對洛陽的想像不僅僅是作為帝國的東都，而主要是一個佳麗之地。是輕薄兒、浪蕩子肆意揮霍的地方」，祝麗君：〈論陳隋樂府詩中的都市書寫及其影響〉，《名作欣賞》第33期（2015年6月），頁125。

西接長楸道，南望小平津。飛甍臨綺翼，輕軒影畫輪。雕鞍承緒汗，槐路起紅塵。
燕姬雜趙女，淹留重上春。(蕭繹〈長安道〉，梁詩卷25)
槐衢回北第，馳道度西宮。樹陰連袖色，塵影雜衣風。採桑逢五馬，停車對兩童。
喧喧許史座，鐘鳴賓未窮。(王褒〈長安道〉，北周詩卷7)
輦道乘雙闕，英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法駕應坤圖。韓康賣良藥，董偃鬻明珠。
喧喧擁車騎，非但執金吾。(徐陵〈長安道〉，陳詩卷5)
鳳樓臨廣路，仙掌入煙霞。章臺京兆馬，逸陌富平車。東門疎廣餞，北闕董賢家。
渭橋縱觀罷，安能訪狹斜。(顧野王〈長安道〉，陳詩卷5)

首先我們看到如「平津」、「槐路」、「廣路」或「燕姬趙女」這些出現於〈洛陽道〉詩的意象，並不專屬於某一特定城市，且無違和感地再度出現於這組詩歌中，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如〈豔歌行〉、〈長安有狎邪行〉、〈相逢行〉或〈陌上桑〉等漢樂府的情節與意象，反覆被召喚（如「採桑逢五馬」、「輦道乘雙闕」、「非但執金吾」等），透過更動意象或辭藻，讓這樣的擬作更具變化性。這讓人聯想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裡章華大夫「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邂逅「群女出桑」的景象。⁵⁴這些美女原本就是伴隨著名都而出現的意象，並不專屬於那一座城市。徐陵詩中用了兩個典故，「韓康賣良藥」和「董偃鬻明珠」。若根據史傳的原典，韓康「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⁵⁵明確提到長安的地景；然而「（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王家」⁵⁶這段，雖為西漢史料但原文倒沒有特別提到長安這樣的城市背景。顧野王的「東門疎廣餞，北闕董賢家」同樣也是類似敘事視角，⁵⁷而這種隸事聯想與疊加的技術，表現出齊梁後的典型藻麗文風。在這些寫作者的想像與勾勒中，長安猶如一座平行時空的存在，各種典故隸事中之人物，故事，意象或情節，都可以同時出現在這座想像之城其中並行並存，而全無生澀乖違之處。

過去學者有一說法，認為南朝作家熱衷於將慣見的通俗典故，進行字面詞彙的更動，造成踵事增華的新奇效果，⁵⁸一方面當然是這樣的書寫策略，讓長安、洛陽這樣對於南朝

⁵⁴ 先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引自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頁75-1。

⁵⁵ 東漢·班固：〈逸民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83，頁2770-2771。

⁵⁶ 東漢·班固：〈東方朔傳〉，《漢書》，卷65，頁2853。

⁵⁷ 當然，這些西漢典故與隸事的主角與其背景，自然與長安有關，此典故聯想並非錯誤的嫁接，但長安地景與這些典故情節上並沒有必然的連結，筆者指的是這樣的一種聯想「技術」。

⁵⁸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書中提到如蕭綱〈與湘東王書〉以及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都會刻意用換句法來表現典故的新奇，頁125-126。

士人而言只能出於想像的古都，增添了歷史的繁華與雕飾；⁵⁹但另一方面來說，這樣的繁榮又僅存在於想像、(文獻的)記憶或出於慾望的投射。或許過去樂府研究認為〈洛陽道〉、〈長安道〉本來即屬於遊冶觀覽題材，但筆者認為，此體到了南朝寫作者筆下增添了宮體敘述與欲望，將典故辭藻拼貼誇飾地極其虛構，卻又反而呼應當時的作者心態與文化意向。

至於另外一組〈長安道〉，筆者以為其宮體化的跡象更為顯著，包括蕭綱、陳叔寶，以及陳叔寶著名的「狎客」⁶⁰陳暄這些寫作者：

神臯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憶，垂柳拂行輪。
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蕭綱〈長安道〉，梁詩卷 20)
建章通未央，長樂屬明光。大道移甲第，甲第五為堂。遊蕩新豐裏，戲馬渭橋傍。
當壚晚留客，夜夜苦紅粧。(陳叔寶〈長安道〉，陳詩卷 4)
長安開繡陌，三條向綺門。張敞車單馬，韓嫣乘副軒。寵深來借殿，功多競置園。
將軍夜夜返，弦歌著曙暄。(陳暄〈長安道〉，陳詩卷 6)
翠蓋承輕霧，金羈照落暉。五侯新拜罷，七貴早朝歸。轟轟紫陌上，藹藹紅塵飛。
日暮延平客，風花拂舞衣。(江總〈長安道〉，陳詩卷 7)

這幾首詩歌就筆者觀察，有明確且強烈的宮體或艷情詩的既視感，比如說蕭綱的「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與徐陵〈奉和詠舞詩〉最末句「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在結構造意上頗為近似。而陳叔寶〈長安道〉看似寫故都的「建章」、「未央」、「長樂」等宮，寫三條大道甲第萬千的氣象，但最末還是收束在其擅長的宮體形容，這「當壚晚留客，夜夜苦紅粧」的敘事，分別就是從同樣陳叔寶所作的〈三婦豔〉中的「大婦正當壚，中婦裁羅襦」、「河低帳未掩，夜夜畫眉齊」脫胎而來，徐陵的共作「將軍夜夜返」同樣也是這般宮體化的書寫風格。

這種樂府詩的艷情化或宮體化，或許並不是什麼太新奇的發現，像〈相逢行〉或〈長安有狎邪行〉等詩原本即被收錄於《玉臺新詠》，而梁陳作者又熱衷寫這類〈中婦織流黃〉

⁵⁹ 如梁代王罔的一首偕擬〈長安有狎邪行〉的作品：「道逢佳麗子，問我居何鄉。我家洛川上，甲第遙相望。珠扉玳瑁床，綺席流蘇帳。太子執金吾，次子中郎將，小子陪金馬，遨遊蔑卿相。三子俱休沐，風流鬱何壯」，清·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91。

⁶⁰ 唐·姚思廉：〈江總傳〉，《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 27：「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頁 343。

或〈三婦豔〉的題材，⁶¹原本三婦或工機杼、或理絲桐的形象，被南朝文人給情慾化而成了宮體派勢十足的作品，但筆者覺得〈長安道〉更值得探索之處在於——此類詩題原本應當以「都城」、尤其像長安這樣的歷史名都為主軸，而〈相逢行〉這類詩歌只是長安城日常即景的一個斷面。在漢大賦中長安除了富麗的宮殿苑獵，豪華的遊俠少年，更多添加筆墨之處如地勢天險和所謂的「崑函之固」，在這些樂府詩舊題新作擬作，似乎已經被邊緣化而隱藏了。

雖然我們仍然能從字行間看到〈長安道〉的寫作者們，如何透過將長安的地景融入，呼應這樣的樂府舊題——如「金槌抵長樂」、「三條向綺門」、「五侯」與「七貴」或「轟轟紫陌，藹藹紅塵」等，關於都城的繁盛、熙攘與豪族市井的形容，但他們書寫下的長安終究還是歸結到了一個偏向艷情、女性、宮體化的空間。筆者以為這一方面當然是他們熟悉也習慣於這樣的語言風格，但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這是梁陳特有的「泛宮體化」的書寫策略。也因為在此風氣之中，長安有了與過去迥然有別的形象與意象，它成了一座投射慾望之城，成了一座幻想之城艷情之城。它當然可能如研究者所說、隱含有江南士人對自身熟悉都城建康的疊合，但卻也未必非得要與建康疊合。這座旖旎、多情而幻美的長安城，可能只是理論中的「絕對瞬時」⁶²，甚至從來不曾存在於任何的歷史或任何人的真實記憶之中。

另外筆者也想延伸來談一下「京洛」這樣一個複合詞，「京洛」本為東京洛陽之稱，其典出班固〈東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⁶³，而這個複合詞於六朝時就已經泛指都城，且是一個無特定指涉的、想像的名都，關於京洛在詩歌中的敘述原型，或許可以追溯至曹植的〈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曹植〈名都篇〉，魏詩卷6）

曹植的這首詩其實同樣鑲嵌沿用了幾個樂府詩的套語和意象，如漢樂府「腰中鞞劍」或古詩的「披服紕與素」等，然而曹植所建構的這個以燕趙妖女與遊俠少年組成的想像之城，熙攘之城，成為其後「京洛書寫」的主軸，如王褒首句與之致敬的擬作〈遊俠篇〉：

⁶¹ 蕭綱、徐陵皆有〈中婦織流黃〉；而蕭統、劉孝綽、王筠、陳叔寶等作者都有〈三婦豔〉詩，顯然這個從樂府裡脫胎來的概念，已經成為新的樂府題目。

⁶² 此即是前文提過傅柯的異托邦理論，請參見前註23。

⁶³ 梁·蕭統：《文選》，頁39。

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遊。河南期四姓，關西謁五侯。鬥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
桑陰徒將夕，槐路轉淹留。（王褒〈遊俠篇〉，北周詩卷1）

這種鬥雞走馬、快意揚鞭等等的豪族遊俠生活寫真、日常即景，進而構築城市繁榮熙攘的關鍵意象，在陳隋時有不少類似作品。若如王文進所說，這是透過現實的建康進而勾摹想像的京洛，那麼確實可以由此一窺當時都城建康的繁榮、甲族門第的富饒，還有膏腴子弟貴遊總角的日常生活型態。至於筆者所說的「無特定指涉」或「去背景」的城市描寫，蕭綱、張正見分別有一首以京洛為主題的詩歌，可以作為例證：

南遊偃師縣，斜上灞陵東。回瞻龍首堞，遙望德陽宮。重門遠照耀，天閣復穹窿。
城傍疑複道，樹裏識松風。黃河入洛水，丹泉繞射熊。夜輪懸素魄，朝光蕩碧空。
秋霜曉驅雁，春雨暮成虹。曲陽造甲第，高安還禁中。劉蒼歸作相，竇憲出臨戎。
此時車馬合，茲晨冠蓋通。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蕭綱〈京洛篇〉，梁詩卷6）
千門儼西漢，萬戶擅東京。凌雲霞上起，鳩鵲月中生。風塵暮不息，蕭笳夜恆鳴。
唯當賣藥處，不入長安城。（張正見〈煌煌京洛行〉，陳詩卷2）

蕭綱的詩很明顯是將兩大都城長安洛陽作了連結，透過複寫「灞陵東」、「入洛水」這種種兩大名都的關鍵地景，將這些歷史名都變成同一個文學題材，成為都城書寫的意象。張正見的「賣藥」同樣用了韓康的典故，表現了長安與政治場域的連結。

在蕭綱詩的收尾，與其說「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是對南朝都城建康的折射，或將歷史名都作為文學題材，是所謂新亭對泣或收復故土不得的慾望，筆者倒覺得這象徵所謂的長安洛陽等故國舊都，對於此際的梁陳士人來說已經從現實走向了非現實，成歷史走向幻想。唯有透過文學的戲仿、遊戲與聯想，這些歷史的名都才勉強有意義——且所謂的意義不過只是存在於文獻、存在於典故的意義。過去學者比對陳隋對城市的書寫差異，認為「陳代詩人想像長安、洛陽的繁華與熱鬧，因為那是他們不能實現的夢想；隋人不喜作關於長安、洛陽的詩，因為他們正忙於建造自己的新城市」⁶⁴。但除了夢想，筆者認為這樣再現之城與真實之城的差異，這正是傅柯式和班雅明式的想像。阿多諾稱班雅明之所以片段描述巴黎的片段，是因為其「寫作方式力圖展現夢幻所追回的那些被丟棄的真實」⁶⁵；

⁶⁴ 祝麗君：〈論陳隋樂府詩中的都市書寫及其影響〉，頁127。

⁶⁵ 法·阿多諾（Theodor Adorno）：〈本雅明《單行道》〉，收錄德·本雅明著，王才勇譯：《單行道》，頁152。

而這並非出於對現實或理性的鄙視，而是班雅明試圖「透過反智的方式重建當今世界剔除的思維本身」。⁶⁶

對南朝寫作者而言，這些文獻裡的意象與地景，都有些類似去除背景後的城市意象——無論是灞陵堤岸，潁川洛水，章台走馬或長樂未央，它們成了靜止的、瞬間的、只能吟誦抄錄而無法企及的場所，成了一種典故拼貼的遊戲，成了文字的蒙太奇。筆者並不認為這些以都城為名的樂府，應當要忠實具現出長安洛陽的風貌。更重要的是在南朝作者的美學視域中，「洛陽」與「長安」已從實際的場所成了想像的場域，⁶⁷它們一方面何其獨特，一方面卻又被覆寫被改動了，成為永遠處於被記錄被覆寫、卻無法完整描敘的城市。這樣趨於永恆的場景，本身就帶有重要的文學和美學意義，且符合當代空間思維之下，一座看不見卻存在於文本中的城市。

四、結語：記憶與慾望之城

美學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追憶》書中曾有一段論及鮑照的〈蕪城賦〉，提出了一個他所觀察的新說：

舊注以為「蕪城」指的是廣陵，不過，從賦文中找不出任何證據來肯定這一點。作品可以適用於類似的別的故城。……一般來說，描述某一城市或者某一地方的賦，總是可以看出它描寫的是哪裡，他們往往大量堆砌細節和傳聞逸事。⁶⁸

姑且擱置此新見的對錯，若依據宇文所安的說法，鮑照於〈蕪城賦〉中運用的就是一種去除特定城市的書寫策略。相對來說，南朝作者書寫的洛陽與長安，一方面確實「大量堆砌細節和傳聞逸事」，但即便如此從這些意象彼此混合、融裁、交滲的狀態中，我們仍能發現與「去特定城市」與「去背景」的傾向與寫作策略。長安與洛陽都「如實地」、全然比

⁶⁶ 德·本雅明著，王才勇譯：《單行道》，頁 152。

⁶⁷ 審查人提到一來這些樂府同題原本就是出於作者主觀，並不能將之等同於再現與具現；又提到：其實本文所謂的再現原本就包含主觀的想像與複寫，且這樣的複寫確實是文學不同於地理學的特徵，值得重視。此外文學作品的結構、修辭、比喻以及典故的延異等等，筆者同樣重視，只是為聚焦本文談的「真實／想像」之城，將重點聚焦於這些比喻與修辭如何游移於現實和文獻之中。

⁶⁸ 美·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頁 83。

照南朝士人所閱讀的文獻典故而被再現出來，但事實上它們已經成為了想像。⁶⁹

總括前文，筆者主要從以「洛陽道」、「長安道」等樂府為主題，兼論漢代的〈兩都〉、〈兩京〉與南朝詩歌裡京洛的意象。過去如王文進就認為南朝寫作者較少描述江南的都城建康，這是因為他們筆下的洛陽與長安，事實上就是建康的投射，而這與他們獨特的時空思維有關；至於劉淑芬也從地志等文獻切入，認為如洛陽在山川地勢之型態，確實與江南的都城建康頗為類似；鄭毓瑜更談到，建康城構築時的「迂餘委曲」，象徵的可能就是士族的心靈圖像。⁷⁰本文重論南朝寫作者對「洛陽」、「長安」的敘事，發現到這些寫作者將他們未必親身見證，只從文獻閱讀以及想像的意象和典故，再透過大量連類、誇飾並帶入名都的描寫技術，他們筆下的洛陽長安，成了猶如異托邦的幻想與一瞬間的暫態。依筆者觀察，這些都城雖未必一定與建康有所連結，但確實反應出了南朝作者的獨特心態，表現出當時代的風格混合的結果；也呈現出他們並非復國而是豔異的慾望。

就筆者所見，南朝寫作者筆下的「洛陽道」、「長安道」等樂府舊題，其專屬特色在於它們高度的「宮體詩化」，如蕭綱、陳叔寶或陳暄特別偏好〈長安有狎邪行〉、〈相逢行〉這類的題材，作為他們致敬的對象（且聚焦於後半段描寫家中女眷的段落），進而將這些艷情意象作為長安或洛陽最主要的特徵。而這些詞彙、形容、構句同樣出現在他們的宮體詩中。總體來說，筆者以為洛陽、長安未必「建康化」，但經過梁陳文人的大量擬作，他們呈現出「宮體化」、「情慾化」的趨向。這樣的情慾或慾望，或許不僅是對樂府詩的女性，更是對洛陽、長安那樣士庶雜沓、男女熙攘的綺豔想像。

當代人文地理學提示我們，寫作者描述一座城市，或許可能不科學也不客觀，因為真實的空間與地理給予人們的體貼，本身就充滿了各種不科學與不客觀的成份。⁷¹時間流動充滿主觀，空間體驗同樣也充滿直覺的感受。對一座城市的記憶包含了慾望的成份，就如同那些被宮體化艷情化的「京洛」——城市裡的風景盡是遊俠金鞭，燕趙妖女。文獻被慾望給改寫成作者期望的樣貌，進而成為真實的風景，最後這些長安與洛陽的書寫也被保存

⁶⁹ 在田曉菲的《烽火與流星》一書的第七章「南、北觀念的文化建構」也提到類似的說法，譬如邊塞詩與採蓮曲，正是南朝士人用以建構「南」、「北」空間形象的題材，筆者參酌美·田曉菲著：《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頁251-274。此外亦對照田氏此書原文，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p.323-358.

⁷⁰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112-113。

⁷¹ 鄭毓瑜論及其《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一書的空間理論運用時，曾經提到：「當空間成為社會關係的產物，或者出現充滿情感的地理學書寫，首先讓文學文本相關的空間的描繪可以脫除「太主觀」或「不科學（不是地理事實）」的世俗認定」，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收錄《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16。

下來，成為洛陽與長安這兩座城市的某一部分樣貌。他們的繁華與情慾可能與歷史事實有所不同，與〈兩都〉、〈兩京〉的真實圖繪也有所不同，但這些去地景化的城市，正是南朝士人所認知的長安與洛陽。或許本文將這些分明以「洛陽」與「長安」為題的詩歌，推演成「去背景」的過程，有些論述過快，但最後筆者想以蕭繹的一首〈春賦〉權充作為本文結語：

洛陽小苑之西，長安大道之東。苔染池而盡綠，桃含山而併紅。露沾枝而重葉，網縈花而曳風。（蕭繹〈春賦〉）⁷²

如今所見蕭繹的這首〈春賦〉僅存六句，不確定是部份亡佚，或原本就是如此篇幅（就筆者推論，若此賦僅此六句亦已完足）。賦的開頭「洛陽小苑」與「長安大道」，就已經完足表現了「春」到處存在的涵蓋性。蕭繹以此兩座都城當成氣勢恢宏的賦端，或許要描寫的是春滿大地的意象，但這篇賦卻側面映襯了南朝士人對於長安洛陽的混淆、想像與不真實。它們成了文獻典故裡美好而用來遊戲、拼貼與對偶的詞彙。即便兩座名都曾經如此真實地存在過，但它們如今都成了春風春鳥、草木物色的背景聲。這也就是本文所嘗試論述的、南朝寫作者獨特的長安洛陽書寫，以及其背後的文化意涵與指涉。

⁷² 梁·蕭繹：〈春賦〉引自嚴可均輯本，頁 3505。

徵引文獻

古籍

- 東漢·班固 Ban Gu：《漢書》*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3 年）。
- 劉宋·劉義慶 Liu Yiqing 著，梁·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清·余嘉錫 Yu Jiaxi 箋疏：《世說新語箋疏》*Interpretations on Shi Shuo Xinyu*（上海 Shanghai：古籍出版社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4 年）。
- 梁·蕭統 Xiao Tong 編，唐·李善 Li Shan 注：《文選》*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6 年）。
- 北齊·顏之推 Yan Zhitui 著，王利器 Wang Liqi 集解：《顏氏家訓集解》*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Yan Cl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
-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晉書》*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Book Company，1974 年）。
- 唐·姚思廉 Yai Silian：《陳書》*History of the Chen dynast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2 年）。
- 唐·李延壽 Li Yanshou：《南史》*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5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隋書》*History of the Sui*（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Book Company，1979 年）。
- 北宋·司馬光 Sima Guang：《資治通鑑》*Reference of 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北京 Beijing：古籍出版社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56 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 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 Shanggu Sandai Qin Han Sanguo Liuchao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1 年）。
- 清·逢欽立 Lu Qinli 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Xian Qin Han Wei Nan Bei Chao Shi*（臺北 Taipei：木鐸出版社 Muduo chubanshe，1983 年）。

近人論著

- 王文進 Wang Wenjing:《南朝邊塞詩新論》*A Study of Poems with Identical Title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Jin BKS, 2000 年)。
- 王文進 Wang Wenjing:《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Nan Chao Shan Shui Chang Cheng Xiang Xiang*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Jin BKS, 2008 年)。
- 王運熙 Wang Yunxi:《樂府詩述論》*Yue Fu Shi Shu Lu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6 年)。
- 王夢鷗 Wang Mengou:《古典文學論探索》*Gu Dian Wen Xue Lun Tan Suo* (臺北 Taipei: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1984 年)。
- 王夢鷗 Wang Mengou:《傳統文學論衡》*Chuan Tong Wen Hua Lun Heng* (臺北 Taipei: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1987 年)。
- 王德威 Wang D.W. David:〈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論〉“Lao Ling Hun Qian Shi Jin Sheng——Zhu Tian Xin Lun”, 收入王德威 Wang D.W. David:《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Into The New Millennium: Twent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2 年)。
- 祝麗君 Zhu Lijun:〈論陳隋樂府詩中的都市書寫及其影響〉“Lun Chen Siu Yue Fu Shi Zhong De Du Shi Shu Xie Ji Qi Ying Xiang”,《名作欣賞》*Ming Zuo Xin Shang* 第 33 期(2015 年 6 月),頁 125-127。
- 陳光興 Chen Guangxing:《文化研究在臺灣》*Wen Hua Yan Jiu Zai Tai Wan* (臺北 Taipei: 巨流圖書公司 Chuliu Book Company, 2000 年)。
- 董乃斌 Dong Naibin 主編:《古代城市生活與文學敘事》*Gu Dai Cheng Shi Sheng Huo Yu Wen Xue Xu S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2015 年)。
- 楊基燕 Yang Jiyān、王志清 Wang Zhiqing:〈樂府文學中的「都市書寫」——以〈長安道〉〈洛陽道〉為中心〉“Yue Fu Wen Xue Zhong De Du Shi Shu Xie——Yi ‘Chang An Dao’ ’Luo Yang Dao ‘Wei Zhong Xin’”,《雲南師範大學學報》*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第 44 卷第 2 期(2012 年 3 月),頁 144-149。
- 蔡振念 Cai Zhennian:〈漫遊與記憶——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Flânerie and Memory: Chu T'ien-Hsin's City Writings”,《臺灣文學研究學報》*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219-239。DOI:10.6458/JTLS.201204.0219
- 劉淑芬 Liu Shufen:《六朝的城市與社會》*Liu Chao De Cheng Shi Yu She Hui* (臺北 Taipei: 台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s, 1998 年)。
- 榮新江 Ron Xinjiang:《隋唐長安：性別、記憶與其他》*Sui Tang Chang An: Xing Bie、Ji Yi Yu Qi Ta*

- (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
- 鄭毓瑜 Zheng Yuyu：《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The Poet in Text and Landscape: Mutual Definition of Self and Landscape* (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2005 年)。
- 日・斯波義信 Shiba Yoshinobu：《中國都市史》*Chugoku Toshi Shi* (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3 年)。
- 美・田曉菲 Tian Xiaofie：《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NTHU Press，2009 年)。
-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鄭學勤 Zheng Xueqin 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2006 年)。
- 美・克特金 Joel Kotkin 著，謝佩姘 Xie Peiwen 譯：《城市的歷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 (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美・柯蘭 Mike Crang 著，王志弘 Wang Zhihong 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 (臺北 Taipei：巨流圖書公司 Chuliu Book Company，2003 年)。
- 德・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王才勇 Wang Caiyon 譯：《單行道》*Einbahnstraße* (南京 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2006 年)。
- 義・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著，王志弘 Wang Zhihong 譯：《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1993 年)。
- Denis Cosgrove,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Michel Foucault, "Heterotopias," *Of Other Spaces*,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1967. (最後瀏覽日期：2018.05.05)
-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7-98.
- 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OI:10.2307/j.ctt1dnn9f8

The Imaginary City: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Luoyang and Chang'an in Southern Poems

Chi, Li-feng

(Received January 9, 2018 ; Accepted May 4, 2018)

Abstract

Even though we all acknowledge that the capital of South-Dynasties is located in Jiankang, the amount of poems related to Jiankang actually represents a small proportion of remaining literary works. On the contrary, Yuefu poems regarding “Chang’an” and “Luoyang” were popular subjects for poets then. Scholars have since considered these subjects as intimations of Jiankang. The author looked deeply into these literary works and discovered that these works are related to odes in two Han dynasties describing their capital.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o describe a city from literary works and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with cities in real life. This article, therefore, cut to the point from two viewpoints. He begins with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 in South-Dynasties and two historic capitals. He then looks into literary works such as “Luoyang Road”, “Chang’an Road”, and “Jingluo Article”. He discovers how they describe the gloriousness of past capitals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se works. Looking back from the results, perhaps scholars in South-Dynasties didn’t realize their memories of Luoyang and Chang’an were connected to their own capital and, moreover, to their complicated nationality, desire and writing style.

Keywords: Luoyang, Chang’an, Capital Writ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Cultural Meaning